

新时期以来重要文学现象 及其文化基因论

王启凡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王后凡 200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时期以来重要文学现象及其文化基因论/王后凡著.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6. 4

ISBN 7—5610—5046—1

I. 新... II. 王... III. 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5192 号

责任编辑: 黄永恒

版式设计: 贾莉

封面设计: 邹本忠

责任校对: 齐悦

辽 宁 大 学 出 版 社

地址: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联系电话: 024—86864613 网址: <http://press.lnu.edu.cn>

电子邮件: Lnuexpress@vip.163.com

印刷厂印刷

辽宁大学出版社发行

幅面尺寸: 140mm×203mm

印张: 8.5

字数: 210 千字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序

王卫平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中，中国当代文学恐怕是与自己的时代、社会结合得最密切的文学。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转型以及文学自身的变革、更新，使中国当代文学形成了几个界限明显、特征突出的阶段：“十七年”的文学、“文革”十年的文学、新时期的文学、新世纪的文学。回首往昔，在这几个时段的文学中，新时期的文学，是最为缤纷、丰富、多姿的，同时也是最为散乱、驳杂乃至无序的。这里有广阔的原野、起伏的丘陵和苍茫的森林。虽然山峰的巍峨也许不及中国现代文学，但是，时代造就了文学，也抬高了文学的平均分数，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文化的多元化以及世界的一体化潮流，已经面向世界的中国，接纳着、承传着来自东西方的各种思想、思潮以及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反映在文学上，各种观念的文学、各种品位的文学、各种追求的文学都在新时期粉墨登场，在文学的演播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重变奏。

那么，面对如此丰富、驳杂而又多变的新时期文学，我们该怎样感知它、领会它和理解它呢？或者说，我们该从何处着眼审视它、从哪里着手梳理它呢？也许我们首先想到了“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现象”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表征，抓住了“现象”、把握了“现象”、梳理出了“现象”，也就等于抓住了“纲”，抓住了新时期文学的主要方面。事实上，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文学，一直处在不断变革、不断自我更新、自我

超越的状态之中。甚至可以说是马不停蹄地制造着种种现象，以至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对这种种文学现象包括文学潮流、文学群体的发生发展、来龙去脉的清理，就成了摆在当代文学研究者面前的严肃课题。事实上，像曹文轩的《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许志英、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等就是这方面的力作，它们都注重对文学现象、创作群体和文本类型的清理、归纳和阐释，为我们学习、理解和讲授新时期文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但是，由于现象本身的丰富、复杂，使我们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不可能一下子穷尽，更何况不同的研究者对同一现象还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也许正是由于这样，当我读完摆在我案头的启凡同志的这部书稿，仍有一种兴奋、喜悦和不小的收获。作者在广泛阅读、借鉴以往现象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着自己的学术上的选择和重构，从而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框架、研究角度和阐释重点。诚如作者在第一章绪论中所说：“在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研究中，从文化角度进行的研究已比较深入，而从文化基因角度对文学现象进行的研究还不多见，我们过多地重视文学思潮、文学现象产生的背景，重视对文学作品的主题、人物形象、情节及艺术特色的分析，却很少涉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文化基因，这使我们的文学研究犹如隔山打牛，不得尽其力。”本书在全面把握新时期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基础上，遴选出几个重要的文学现象，透过它们的形成过程、同构现象来寻找支撑这些现象的精神内核——文化基因，从而阐释在文化基因的作用下各种文学现象的本质特征，为我们深入领会这几种重要的文学现象，理解新时期文学提供了一个值得信赖的文本。

回顾近几年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总结过去和跟踪现在是两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在总结过去中，反思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重估“文革”文学、重读五六十年代的文学经典都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启凡同志的研究也是属于“总结过去”的

范畴，她聚焦八九十年代的“王蒙现象”、“高晓声现象”、“王朔现象”、“新历史”小说现象、“新写实”小说现象这五大文学现象展开研究，所涉作家作品无疑是众多的，这给研究带来了难度。它远比单论某一位作家或某一部作品艰难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选择了艰难。她将每一个文学现象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下去分析，注意条状和整体的把握，这种研究更能看出作者学术整合的功力。从本书中我们看到，作者对每一种文学现象的同构现象的描述，对文化基因的阐释都是很有特色、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作者善于从“这一个”挖掘开去，扩展到“这一类”，进而展开文化基因的分析。经作者的条分缕析的梳理，使一个个文学现象从混沌到清晰，从驳杂到整合，从无序到有序，完成了自己的学术建构。

从研究的层面来说，本书是属于文学的文化学层面的研究，即将文学现象与社会、政治、历史、哲学、意识等文化领域关联起来，借他山之石以攻玉。其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开阔视野，激活思想，拓宽思维，更新内容，拓展研究空间。从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背后，寻找与之相关联的文化因素和深层信息，进而为文学现象作出文化评判和文学定位。但这种文学文化学的研究，弄不好容易产生泛文化的倾向、非文学的偏差和空洞化的弊端，甚至泯灭了文学研究的特殊性。本书没有滑入这样的偏颇，而是有效地避免了空洞化和泛化。作者能够紧紧围绕某一现象的主体作家和相关作家而展开叙述，注重文本中文化基因的承传和扬弃，也就是说，作者的文学文化学研究，是始终和文学作品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从更高的学术水准来要求，本书也有一些局限。比如，作为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作者的视野还显得不够开阔，文笔似乎还有点拘谨，在多学科交融上，尚需进一步的放开。再比如，从研究的广度上说，本书仅仅围绕新时期的五大文学现象而展开，除此而外，还有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也可进入作者的研究

视野。这些希望在作者以后的研究中得到弥补、充实和完善。

作者是一位很有发展潜力的青年学者，她的刻苦努力和好学深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作为同是省内从事高校教学与研究的同行，我不止一次看到她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又有机会在学术会议上相遇，每每探讨的也都是学术问题。相信她在本书的基础上，还会写出更有分量的力作来。

2006 年 2 月 19 日
于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新时期以来出现的重要文学现象.....	(1)
第二节 文化基因与文学现象.....	(5)
第二章 传统文化基因的继承与扬弃——“王蒙现象”研究 ...	(11)
第一节 “王蒙现象”的认定及其同构现象.....	(11)
第二节 “王蒙现象”的文化精神 ——王蒙式的忠诚	(17)
第三节 “王蒙现象”的文化基因.....	(28)
第三章 鲁迅精神一脉——“高晓声现象”研究	(84)
第一节 “高晓声现象”的认定及其同构现象.....	(84)
第二节 “高晓声现象”的文化精神.....	(95)
第三节 “高晓声现象”的文化基因	(103)
第四章 后现代文化精神的继承与创新 ——“王朔现象”研究.....	(126)
第一节 “王朔现象”的认定及其同构现象	(126)
第二节 “王朔现象”的文化精神 ——挑战权威、反叛传统.....	(136)

第三节	“王朔现象”的文化基因	(148)
第五章	在传统与后现代文化间升腾与坠落	
——	“新历史”小说现象研究	(179)
第一节	“新历史”小说现象的认定及其同构现象	(179)
第二节	“新历史”小说现象的文化精神	
——	展现了一种“新的历史意识”	(185)
第三节	“新历史”小说现象的文化基因	(194)
第六章	与后现代文化相融合的自然主义精神	
——	“新写实”小说现象研究	(224)
第一节	“新写实”小说现象的认定及其同构现象	(224)
第二节	“新写实”小说现象的文化精神	
——	对原初现实主义的回归	(233)
第三节	“新写实”小说现象的文化基因	(247)
参考文献		(258)
后记		(263)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新时期以来出现的文学现象

一、新时期以来出现的文学现象概述

在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研究中，从文化角度进行的研究已比较深入，而从文化基因角度对文学现象进行的研究还不多见。我们过多地重视文学思潮、文学现象产生的背景，重视对文学作品的主题、人物形象、情节及艺术特色的分析，却很少涉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文化基因，这使我们的文学研究犹如隔山打牛，不得尽其力。

我们知道，人类进化是人的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的统一。人之所以为人，是人能创造文化，并以文化来塑造自己。文化是人的第二生命，人是生物生命和文化生命的统一体。显然，文化与人，文学现象与文化基因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

本书从新时期以来的几个重要文学现象入手，透过它们的形成过程、它们的同构现象及其文化精神，来寻找支撑这些现象的精神内核——文化基因，从而阐释在文化基因的作用下各种文学

现象的本质与贡献。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迅猛已极,各种文学流派风起云涌,各种文学思潮竞相登岸,各种文学现象此起彼伏,给中国的当代文坛带来了异常繁荣的局面。

新时期文学的发端是“伤痕文学”,那时,人们为了宣泄积压十年的满腔悲愤,控诉极“左”路线和“四人帮”的罪恶,匆忙上阵,唱出了一曲曲令人回肠荡气、激动人心的歌。从那时起,文学便急急忙忙、曲曲折折地上路了。相继而来的是“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继续和深化,是痛定思痛后对造成这场浩劫背后的原因的揭示、总结和反思;“改革文学”的出现意在指出中国今后的出路,“王蒙现象”、“高晓声现象”便包含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兴起,文学逐渐失去了原有的轰动效应,在万花筒般旋转的世界里,文学犹如一个幻影,一个梦。

文学毕竟是极具个性化的艺术创造,其中必然将如胶似漆地溶进个人的气质、经验、人生境界、理想追求和思维观念。文学需要感性、直觉和形而上,以形成个性化。于是,文学家们开始了对文学本体的探究,“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的发生大抵就是如此,韩少功、阿城、残雪、马原等的创作是其代表。但“先锋文学”的本体化研究、“寻根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表述离大众欣赏能力太远,一时间,文学又落入低谷。可以说,这一时期,作家对文学本体的探索与读者对文学的或冷漠或热衷是同步的。

不过,文学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它不会永远如“孤独的羌音”,因为它毕竟是人的自由的心灵的创造,也是人的文化心理发展的需要。于是,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大众文学)携手同行。20世纪80年代末期及以后,“残雪现象”、“红高粱现象”、“搭错车现象”、“新写实”小说现象、“新历史”小说现象、“王朔现象”、“过士行现象”等相继出现,在

当代文坛引起阵阵轰动。这些现象是随着作家对社会现实认识的深化、读者体会的深化和社会形势的进一步发展而产生的，既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精神现象，更是五千年文化香火的绵延。

二、文学现象及其内涵

“现象”一词源于哲学术语，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外部表现形态和联系。由此导出所谓文学现象，就是指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那种引起社会轰动的文学形态或文学创作思潮。新时期以来出现的文学现象颇多（如上所述），但本书只着重论述“王蒙现象”、“王朔现象”、“高晓声现象”、“新写实”小说现象及“新历史”小说现象。前三个现象是作家作品现象，后两个现象是文学创作思潮现象，它们在新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坛轰动很大，影响深远。

“王蒙现象”是我国新时期出现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它的出现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关系极为密切。粉碎了“四人帮”，砸碎了人们精神上的枷锁；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则否定了肆虐几十年的极“左”路线，个人崇拜幻灭了，毛泽东走下了神坛进入民间，随之而来的是人们陷入了一种极端的状态——精神迷失，信仰失落。王蒙就是在这个时候以他的小说所塑造的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向人们呼吁忠诚信仰，坚定理想和信念。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无论时代风云怎样变幻，也无论遭受了怎样的残酷打击和政治迫害，都矢志不渝，表现了风雨蹉跎的一代共产党人信仰忠诚，虽九死而不悔的精神。同时，他的小说对新中国所走过的几十年的道路作了全方位的反思，总结了教训，向全党、全社会呼吁，“救救右派”，“救救知识分子”，“救救干部”，“救救孩子”，呼吁民主法制和民主政治，展示了作家内心深处的、具有新的历史内容的忧患意识。虽然王蒙后期文学创作发生了改变，但其“反思文学”的先声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高晓声现象”是新时期出现的较为独特的“乡土文化”——农民文化小说创作现象。高晓声既是反思文学的代表作家，又是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陈奂生”系列、《李顺大造屋》，从“吃”的和“住”的两方面对几十年来的极“左”政策给农村、农民的生活和农民的心灵造成的伤害进行反思，对我国农村政策的多变性提出尖锐的批评。更重要的是，他塑造的陈奂生、李顺大、江坤大等农民形象仍然带有鲁迅的“阿Q”的影子，甚至是“阿Q”的同类人，再一次提出了“国民性”改造问题，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批判。

“王朔现象”是市场经济和商品大潮直接催生的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分析的文学现象，它再现了新一代北京底层市民的生活、思想和观念。他的小说所塑造的主人公——“顽主”的形象，虽引起众多褒贬，甚至是抨击，但他们代表了一代人、一类人——多余人、边缘人的生活方式，为当代文坛形象画廊增添了鲜活的一笔。他创造的新市民文化和商业文化，代表了新时期以来的大众文学——通俗文学的方向和原则。

“新写实”小说现象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出现的文学创作思潮现象，是当时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文学创作倾向，即一些新锐作家跳出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樊篱，摒弃了典型化创作原则，以零度情感和客观的态度，开始了他们认为带有“新意”的小说创作。他们直接探入小人物的生活世界，展示了小人物们真实的人生本相——困窘、无聊、无意也无奈及灰色的精神向度，人人都在现实之海中流浪、奔波，然而，结局却是一无所

“新历史”小说现象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出现的又一个文学创作思潮现象。从先锋派和“新写实”小说家中分离出来的一些作家，接受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影响，将笔触探向历史，以新的历史观念写出了他们个人化记忆中的历史——家族史、村庄史和战争史，表达了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在

“新历史”小说家的笔下，历史成了一位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块任人涂抹的画布，历史是无序的、混乱的、过去的故事的复述，失去了原有的历史的宏大叙事的整一性、必然性和进步性，将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颠覆为一切历史都是“权力与性”的欲望的争斗史。

第二节 文化基因与文学现象

一、文化与文化基因

基因是生物遗传学的一个术语，基因是指遗传的化学传递者，即人从自己的先人那里继承的肌体结构。社会生物学家认为，基因对人的行为包括社会行为作用很大，人的社会行为既是基因的产物，也是环境的产物。文化人类学则认为，基因对人的社会行为的作用是有限的。兰德曼说：“人生而有之的身心结构不是一切，这只是他的全部实在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我们还应研究它在客观精神中的根”^①，即文化的制约力量。

所谓文化，是“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包括后天获得的，作为特定社会或民族所特有的一切行为、观念、习俗和态度。”^②文化基因则是特定社会团体或国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从上面所言可以看出文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文化是积累起来的、为某个社会团体或某个民族所共有的。

^① 米夏埃尔·兰德曼：《哲学人类学》，张乐天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17页。

^② C·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异》，杜杉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页。

比如过春节，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共有的文化风俗习惯。

文化是后天习得的。人类大多数行为、观念、态度、风俗都是借助语言交际习得的，我们所具有的知识都是后天学习所得。

文化是整合的。构成文化的诸要素或特质不是习俗的随机拼凑，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相互适应、相互磨合，进而达到和谐一致。社会心理学研究也表明，人们倾向于自觉改变那些从认知和概念的角度看来与其他信息不一致的信念或行动，如果这种谋求认知趋于一致的倾向普遍存在于人类的话，文化的一些方面往往会由于这个原因而整合。

文化是变迁的。文化具有适应性和整合性就意味着文化是不断变迁的。例如，文化的某个方面响应环境之变迁而发生了变化，文化的其他方面就很可能相应发生了变迁。

文化具有适应性，即文化习俗对特定的自然和特定的社会环境的适应。对自然环境和生物环境的适应也代表着对社会环境和邻近民族的适应。

由此可见，人是创造文化并为文化所塑造的，是文化生命的存在。文化对于人，如同外界供人呼吸的空气，如同体内维系生命力系统的血管、血液，是必不可少的。人与文化交织一体，缺乏文化，就缺少了做人的起码条件。所以，人既是社会的存在，是历史的存在，更是文化的存在。人的先天本性中就包含着文化因素，如同我们在生活实践中能够航行于远在我们时代之前就由我们的祖先开掘的运河系统一样，“我们不仅生而就具有自己作为个体的天赋，同时也被投入由祖先积累起来的，并传给我们的某种文化的外部装置中，除了我们自己主观精神外，我们也从祖先那里接受了客观精神的礼物，我们只需被纳入可以得到的这个客观精神的轨道中。我们的生活在漫长的延伸中绝对无需自主性，而是使现已存在的生活方式重新现实化，正如伦理规范的那

样，我们被所有领域中现已存在的规范所引导”^①，这就是我们存在的基础，是由整个民族世代代经历的经验积累起来的共同财富——文化及文化基因，而我们就是这种财富的继承者和受益者。

19 世纪末以来，出现了众多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赫德、卢梭等人的文化进化论，在达尔文主义影响下的泰勒的进化理论，这些理论大多建立在对原始社会的研究的基础上。可见，文化是在承袭前人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发展的。

同时，文化也是在交流中不断演变和发展的。现代文明得益于那些迄今存世的各类文化，“非洲音乐对当代流行音乐的影响，日本版画对梵高艺术创作的影响，非洲雕塑对毕加索绘画的影响，以及更普遍的日本建筑对西方现代建筑风格的影响”^②，这足以证明人类文化的发展无异于基因库的使用。

所有的民族都具有一种心理的一致性，也可以通过传播，即两种文化的交流，从一个社会传向另一个社会，从而形成新的整合。同时，文化在传播演变过程中，文化的基本精神——文化基因也随着传播，有机地结合进其他的民族文化中。

二、新时期文学现象与文化基因

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和精神现象，它的产生和存在往往是社会和时代的晴雨表。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处于一种转型期的变动和改革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内部，党和国家清除了极“左”思想的弊端，将国民经济发

① 米夏埃尔·兰德曼：《哲学人类学》，张乐天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08 页。

② 施舟人：《中国文化基因库》，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7 页。

展作为工作的重心，把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 20 世纪末达到小康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因此，社会形势、人们的社会观念和社会心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当多年来一直作为人们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支配力量——神喻的力量不见了、乌托邦的迷人的魅力消退的时候，人们一下子从高高的云端落入地面，从形而上的理想的理性坠入形而下的生存层面，信仰失落了，没有了以往那种远大的精神追求，有的是自我欲望的实现和为了世俗生活利益的纷争。作为特殊意识形态的文学，也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的观念的变化，摒弃了传统的浪漫主义和传统的宏大叙事原则，开始寻求自己的道路。

外部，整个世界都处于一种全球化的运动中。经济的全球化、信息革命化、文化的后现代化对世界各国的冲击都很大。当改革开放政策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国门，当商业大潮猛烈冲击国人的时候，西方的各种文学理论、现代和后现代主义文化也与中国文化交汇、碰撞了。在与西方文化理论的交流碰撞中，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吸取了其合理的、符合现阶段国人心境的文学理论和文化基因，形成了多种模拟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或后现代文化现象。

如此说来，新时期文学现象的发生与发展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自身的传统，二是西方观念的影响，即对传统文化基因和西方文化理论的继承。

“王蒙现象”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前期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承继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五千年知识精英的精神血脉——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表现出一代共产党人对信念、理想的忠诚和坚定，对党的忠贞与爱戴。

“高晓声现象”继承了传统文化和鲁迅精神的基因，以现实主义为根基，表现出作家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批判了现阶段国民身上存在的劣根性，以期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王朔现象”以存在主义为哲学基础，继承了西方后现代主

义的文化基因，从深层的虚无中走来，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大众文化，使文学——千百年来知识精英们的“飞天袖间的从未落到地面的花朵”，在平民的世界中绽放了，形成了具有“王朔体语言”特色的新市民文化和商业文化。

“新历史”小说现象继承了西方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基因，以新的历史意识、历史观念，重新书写并改写历史。他们认为，人对历史的认识永远是主观的，而不可能是纯客观的，人的历史认识永远不能达到绝对永恒的历史本体。在他们的眼里，历史是小民百姓创造的，是由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普通人创造的，“不仅仅表现在历史关头他们受某种信仰、观念、主义鼓舞所激发出来的狂热或激情，所成就的事业如革命、起义、造反、暴乱等等，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们琐细平淡的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观念。决定历史和制约历史的力量归根到底源自于这些近乎本能和无意识的生存活动之中。这种历史观无疑要比眼睛盯在革命、战争、造反之上的历史观更能抓住历史的根本、人的根本。”^①“新历史”小说解构了宏大的历史叙事，使历史从官修“正史”的神坛和御用文人手中脱离，走入民间，展示了民间化、个人化、陌生化的历史。

“新写实”小说现象，是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相融合的自然主义精神的产品，它以纯客观的态度，纯自然的描写再现了底层百姓的生活本相，展示了生活的本真状态。在除幻、还原中看到真实的人生世相——庸俗的生活品味，庸常的生活状态，灰色的精神世界，鄙陋的人性与人格，表现了当下社会中的人们无安全感、无保障感的流浪意识、悲剧意识。

有人认为，20世纪末期文学进入了后现代消费期，是随读者市场而动的。其实，文学是随着作家的心态而动的，像个流浪者，你无法测度、看清其最真实的面目和特色。它在宣泄一种意

^① 王健：《关于“新历史”小说理论的思考》，凤凰网，2004年8月23日。